

2020年2月23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那么，是什么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考验而不倒，至今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培养和孕育的以智、仁、勇“三达德”为代表的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凝聚了中国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仍是当前疫情防控攻坚克难、取得胜利的文化密码。

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智慧是明德的作用和体现。《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从根本而言，虑而后能得的智慧来自于“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定力。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但同时也保持了高度的冷静，沉着应对，迅速部署，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使得疫情防控工作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序进行，在克服重重困难和不断解决问题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为疫情防控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党中央沉着冷静的定力，为情绪波动紧张的全国人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智慧的集中表现是明辨是非。孟子就把智当作判别是非的一种能力，

智、仁、勇：破解疫情的传统文 化密码

□ 刘余莉

提出“是非之心，智也”。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也出现了谣言四起的现象。面对这些谣言，有智慧的人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不信谣不传谣，真正做到了“谣言止于智者”。党的宣传部门和重要媒体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及时辟谣，并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同时，加强对外宣传，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所有这些，非大智者不能为也！

仁，源出《尚书·金縢》“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美好品德。先秦儒家都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这是因为，中国古人重视“天人合一”，强调“与天地合其德”（《易经·文言》）。而天地之大德，是生养万物。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讲的正是天地生养万物而无有偏私，爱护万物而一视同仁的精神。“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正

是仁。王阳明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正是在这种“一体之仁”的中华传统文化理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题，这正是顺应天道规律办理政治、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

人效法天德来生产生活，也应当好生而恶杀。所以，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了凡四训》中也讲：“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月，牺牲毋用牝。’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君子远庖厨，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动物被杀时血淋淋的场面，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正是这种“恻隐之心”，被孟子称为“仁之端”。而新冠肺炎的发生，与人类对野生动物缺少恻隐仁爱之心密不可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以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巨大

隐患，给予了广泛关注。2月24日，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及时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为打赢疫情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立法保障。这正是孟子所言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国人顺应天地自然之道来生产生活，重新体悟庄子“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重新认识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自然观，重新树立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观，重新理解张载“民胞物与”的价值观，重新领会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道德观，摆正人在自然界中“与天地参”的位置，“赞天地之化育”，保持人与万物和谐一体的发展关系，真正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那么这将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不仅可以帮助中华民族，也可以帮助全人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勇，《说文解字》解释曰：“勇，气也。”其注曰：“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左传》曰：其用之谓勇。”可见，勇是一种气概，是浩然之气的外在表现。孔子说：“勇者不惧。”勇者所表现出的特征就是不畏惧，包括不惧死亡。正如《左传》中讲：“知死不辟，勇也。”而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勇气，是其心志产生的作用。所以孟子说：“志，气之帅也。”孔子也说：“见义勇为，无勇也。”

在疫情防控这场严峻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

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些“最美逆行者”之所以具有知死不退、见义勇为的果敢与担当，是因为他们心有所守，胸怀道义，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正是以智仁勇三达德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使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种中国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长、在磨难中奋起，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当前，我们仍然需要具有智、仁、勇精神的志士仁人，在疫情防控战中再次挺起中国的脊梁，为国际社会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实际行动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变困难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智、仁、勇，正是破解新冠肺炎疫情的传统文 化密码。



兼爱和睦 礼化越南

——中外家训交流与互鉴（三）

□ 柯 昊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一直保持宗藩关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两国已有频繁的文化交流。越南家训文化建立在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儒家思想对越南家族、文字、科举、教育、外交文化等方面均有深刻影响，这是其家训文化建立的基础。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家训伴随着儒学在越南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逐渐发展、成熟。特别是儒家教育和科举制度在越南的建立和完善使家训文化在陈朝、后黎朝、阮朝历史发展中达到高峰。

文化交流是越南家训形成的基础

越南家训文化建立在中越文化交流互鉴基础之上，自公元前207年，南海郡尉赵佗乘秦末之乱，建立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北区设交趾、九真二郡，儒家学说开始传入越南。越南当时还是村社部落联合体，既没有国家和文字，也没有家庭。赵佗一面效仿西汉王室的儒家定于一尊的典章制度，“治越有文理”；另一方面因俗而治，“椎髻，从其俗而治之。”之后在东汉时期，儒家学说的家庭伦理文化开始传入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越南的宗法血缘社会结构。

公元42年，东汉王朝派遣马援南征交趾，特别注重当地的文化治理，“教其耕稼”“治城郭”“建立学校，导之礼仪”，派遣大批循吏因俗而治。这才逐渐改变了原来“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社会状况，并依据儒家伦理文化建立了相应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东汉循吏任延在任九真太守时“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初设媒聘，始知姻娶”，使骆越之民“始知种姓”。从此以后越南逐渐形成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宗法血缘社会。

与此同时，汉字传入，成为越南正式官方文字，直至公元13世纪，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喃字，喃字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上与汉语语音可以对应，但越南各级行政机关颁布法律、公告、文书时，仍需使用汉字。汉字文化为越南家训

文化形成提供了载体。

之后的封建时代，儒学成为越南官学，通过教育和科举制度培养了大量进士群体，相应以此为核心衍生出世家大族。李仁宗太宁四年（1075），开始第一次科举；黎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培养出大量的进士。而且黎朝的圣宗和太宗尤为精通儒学，重视儒家教育，设立国子监和各级府学。由此，“进士群”及其家族逐渐发展壮大，借皇家刊立的《进士题名碑》，在社会变成一种特定的阶级并有特殊的象征标志。越南的家训也在这一文化交流的顶峰时期蓬勃发展，臻于成熟。

儒家伦理文化是越南家训的核心

现存越南家训有30多篇，皆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主要由儒生或者进士撰写，其中后黎朝和阮朝时代作品居多，汉文版本多于喃文版本。越南现存最早家训是两国状元（越南陈朝和中国元朝）莫挺之撰写的《训孩歌》。《训孩歌》以家法训诫家族中的子孙后代，使莫氏家族延续发展，其六世孙莫登庸成为莫朝的开国皇帝。同时，由于《训孩歌》简明易懂，被收入僧人慧身编订的《禅宗本行》一书中，广泛运用于越南家庭教育。

第一本越南语书家训是阮廌写的《黎朝阮相公家训歌》，包括六篇，以“天理”为核心，涵盖对子女、弟子修身处世的训诫。阮廌（1380—1442年）文武兼备，精通汉文，是明朝进士，经历中兴陈朝及新陈朝，后为后黎朝前期开国宰相。

越南家训在阮朝时发展成熟，多模仿中国名训，体例完备，内容全面。阮选（1793—1871年）所作的《阮唐臣传家规范》最为系统，包含有谨门庭范、孝事父母、敦睦夫妻、信孚朋友、修身品行等六大门类，涵盖父母、夫妻、朋友等儒家主要家庭伦理关系。其中所述道德价值多受朱子学和阳明学影响，“良知”和“理”成为家庭伦理关系的义理支撑。除此之外也大量引用《袁氏世范》《居家杂仪》《温氏母训》，兼具南宋家训“训俗”的特点，训诫对象有了从家门子孙后代到当地民众的变

化，训诫方式也引入儒家礼学内容，使礼仪规范进入百姓日用，从而达到“厚人伦，美风俗”目的。

除了这种越南自撰家训，还有从黎朝以来，儒学成为官学后，正式颁布从而得到广泛流传的家训，如《朱子家政》《明道家训》等。后黎朝圣宗时期（1442—1497年），出现了首部皇帝颁定天下的家训——《二十四训条》，是越南当时家天下格局的产物，有半法典半家法的性质。黎圣宗精通四书五经、百家诸子，推行系列以儒教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二十四训条》主要以儒家家庭伦理文化训诫臣民，主要内容是用儒家的纲常礼教教化人民。

越南家训的民族特色

越南家训文化虽然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也有其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特点。

首先，越南家训有突出的等级化倾向。中国传统家训是建立在儒家“礼制”文化之上，家族和社会成员均有长幼尊卑之分，家庭规范不是表象意义上的礼仪和礼节，而是社会的等级秩序体现。越南家训文化的等级化并不突出，却更为突出共同体关系。家庭中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乃至扩展至乡党、同僚、官军民各种关系更讲求共同体精神和维系，这也是其农业社会、万物有灵信仰、进士农家出身等社会特质所致。

其次，越南家训重“仁”。越南家训中的“仁”是最为高尚的道德。但这种重“仁”加入了越南本土“兼爱”的思想，趋向于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和睦相亲、相爱相处，使仁爱、宽容成为越南家训中核心的民族传统美德。

最后，越南家训中的“忠”“孝”观念变化为“忠国”和“孝民”。中国传统家训的忠德，在宋以后，核心要义是忠君；而孝的主要含义是孝亲。越南家训中的忠观念更强调忠国和孝民，这也是抗战战争中越南提出“忠与国、孝与民”的原因。



从交友习语看古人的交友观

□ 石志刚

古代交友习语有许多，包括肺腑之交、君子之交、刎颈之交等。每一个交友习语背后，都能找到出处或者典故，蕴藏了丰富的历史内涵。透过这些交友习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在对待交友问题上的独特眼光，对于今人交友有着重要的启迪。

肺腑之交

身处宦海，起伏起伏、跌跌宕宕，加之受政敌攻击，受舆论瞩目，古代官员能够找到谈论知心话的人比较少。肺腑之交指的就是在艰险的政治环境中，能够推心置腹、互相无话不说，由此形成的友谊。肺腑之交典出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诗歌：“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元白之谊被人传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有着共同的文学理想和诗歌主张，有着共同振兴朝政、谏言救世的政治理想，有着被政敌排挤和陷害、被贬地方、颠沛流离的仕宦阅历。

唐代的柳宗元与刘禹锡也是肺腑之交的典型代表。二人年少才华横溢，高中进士，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旨在革新朝政、改革弊端，结果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强大阻挠，最后归于失败。柳宗元与刘禹锡因此被贬。共同的政治理想、共同的贬谪生活体验，拉近了二人的距离。二人在诗书酬和中深化友谊，成为了肺腑之交，



成就了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

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迁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迁为播州刺史。播州地处西南绝域，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柳宗元对朋友说：“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柳宗元于是上奏朝廷，表示愿意与刘禹锡对调地方。唐宪宗于是改迁刘禹锡为柳州刺史。柳宗元代友播迁，受到韩愈的高度赞扬。韩愈深刻剖析了当时不良的交友风气：“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谢却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通过对比不良交友习气，韩愈最终高度评价赞扬柳宗元的交友观。

君子之交

君子之交指的是看似平淡实则重道义的朋友。君子之交语出《庄子·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之交意在强调真正朋友的交往不在形式、而在于内心、在于道德、在于格局。

西汉末年的朱晖从小就培养出有浩然正气的气概，“早孤，有气决”。13岁的时候，他遭遇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在与其外祖母等一家人从田间出逃的途中，在路上碰到一伙强盗持刀抢劫妇女。“困穷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朱晖却拔剑而出，对着盗贼说：“财物皆可取耳，诸君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盗贼钦佩朱晖的胆量，“遂舍之而去”。因其重义，能够对未曾谋面的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体现出他君子之交的高雅品质。他在刘秀当了皇帝后出任临淮太守，“进止必以礼”。

朱晖为人威严，给人一种冷面之感。他的同乡张堪素有名气，其对朱晖像老友一样敬重有加。张堪生前拉

着朱晖的胳膊，对朱晖说想把自己的妻儿托付给他。朱晖当时拱了拱手，没有说话。等到张堪去世后，听闻张堪妻儿生活较为贫困，朱晖亲自去探视，并带出大量钱财粮财物。朱晖的儿子很好奇，问其父，平常没有听朱晖谈到过张堪，为什么要周济他家妻儿呢？朱晖回答：“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朱晖与张堪的友谊就是君子之交，平常没有轰轰烈烈的交往，感觉很平淡，等到需要帮忙照顾的时候，却又不容辞。

刎颈之交

刎颈之交是指哪怕砍头也不会变心的朋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这个典故千古流传，述说着名相蔺相如与名将廉颇之间由误会到精诚团结的故事。

东汉末年的荀巨伯以讲信义而著称于世。有一次，荀巨伯远行到一个地方见到好友的时候，恰逢胡人攻打这个地方。好友对他说，我现在活不成了，您赶紧走吧。荀巨伯说：“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等到胡人攻破了这个地方，见到荀巨伯，对他说：“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荀巨伯回答：“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胡人听了以后，非常受感动，纷纷感慨道，不讲义义的人进入了讲仁义的地方，实在是不应该，于是胡人将部队撤出该城，该城因此而得以保全。荀巨伯舍生探病，可以说是刎颈之交的生动例证，是对当时存在的不良习俗进行矫正的尝试。荀巨伯在交友方面，没有“逐名逐势”，没有“不相分”“不相恤”，成为“舍生取义”的典型。